

從異文化、比較性到世界化研究： 微觀與巨觀之辨

劉紹華*

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強調民族誌式的田野調查，在分析上則並重人類的普同性及特殊性，由其來思考微觀與巨觀之辨，對於其他學科亦應具有參考意義。

人類學在世界各地的學術前身，其發展脈絡與研究重點各有不同。以影響當代學科最鉅的美國人類學而言，自 19 世紀末開始發展，尤其 1902 年「美國人類學之父」法蘭茲·鮑亞士 (Franz Boas) 在哥倫比亞大學創建全美第一間人類學系起，建制後的人類學就是一門比較文化的學科，且以「異文化」研究為重。鮑亞士推動的主要學術目標，是由此認識論與方法論出發，提出反種族主義、反原住民文化滅絕、反社會偏見、反殖民主義、反戰等重要理念。

換言之，人類學者對異文化他者的認識與尊重，除了展現多元主義的價值主張外，更藉此反思己文化的偏見、特性或盲點。這些理念成為人類學的巨觀重點。然而，如此建立在對他者微觀理解之上所形成的巨觀重點，在 20 世紀末，可能由於新興議題的分化與學術理論的碎化，逐漸呈現式微傾向；或者可謂反向趨勢，即微觀興趣成為主要目標，巨觀格局僅為問題意識或理論偏好的背景。在此趨勢下的研究成果，常見往微觀或巨觀的兩端傾斜，在學術公共性或延展性上的侷限明顯。

一、研究傾向的概念化類型

常見的微觀或巨觀重點傾斜，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不過，在討論之前須先說明，「微觀」或「巨觀」的格局定義具有相對性。對於不同的學科、研究者或情境而言，定義可能有別。例如，對某些人類學者而言，村落或部落已是相對於個體或家庭而言的巨觀脈絡。但對某些經濟學者來說，國家乃至全球格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科技部人文司人類學及族群研究學門召集人

局才堪稱巨觀。以下為了方便跨學科的交流，名詞使用主要採取一般討論時的指涉：「微觀」指個人、家庭、村落、部落等在主體或空間上涵蓋範圍較小的研究對象。而「巨觀」則指集體社會、國家、全球化、乃至種族主義等跨界結構面向。

(一) 微觀—微觀：內向封閉型的研究目標

研究主題與興趣若從微觀始、也止於微觀，微觀知識的描述即為目的，可謂「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 的目標極端化。這樣的知識目標，舉例而言，若是基於「搶救或保存文化」的多元理念，也許仍可連結至巨觀意涵。但實作上，這類知識的研究發展，已逐漸出現自成一格的狀態，只有共享興趣的社群得以交流，缺乏普遍性或外部連結的企圖，屬於內向封閉型的研究目標。

(二) 微觀—巨觀：資料不足的窘境

問題意識若始於微觀，但在深入研究的同時，也能提升格局，將厚資料或深描 (thick description) 所形成的地方知識脈絡化、甚至理論化，就具有巨觀意涵。可惜常見的情形是，微觀資料的厚度或廣度不足，或微觀資料與巨觀脈絡間的銜接性資料或分析不足，造成微觀案例和巨觀論點之間的明顯落差，缺乏說服力。

(三) 巨觀—微觀：理論空洞或形式化

理論是學者和學子在研究、書寫時常見的焦慮來源。以民族誌等質性研究而論，若從巨觀出發，採取比較性取徑，深入微觀後歸納分析，再將研究提升至巨觀脈絡或理論化，可有重要發現。然而，這樣的理想並不易落實。

以 21 世紀流行的理論或巨觀概念為例，如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行動者網路理論 (ANT)、本體論轉向、人類世等，是國際學界提出的新思維或方法取徑，具有認識論思考或調整研究關注的重要啟發。引入本地後，帶來刺激學術活力的效應。但同時也常見一種現象，亦即雖以巨觀理論引導研究方向，卻無法在微觀層次上落實有效可行的具體研究問題與充分資料，以致於從巨觀理論快速落地至微觀層次後，就再也上不去了，出現理論空洞或形式化的乾澀結果。對此學者間的戲謔形容是：「(理論與資料) 油水分離。」在充滿理論焦慮的學界中，這可能是幾種類型中最為常見的一種。

(四) 巨觀—微觀—巨觀：公共性與啟發性的研究型態

最理想的研究型態，應是在巨觀與微觀之間來回辨證。不論是從巨觀理論出發（如推論或演繹型研究常見）或從微觀問題意識出發（如歸納性研究常見），都能往另一方向深入探索後，再進一步上升或下探，以連結原初方向的討論。如此微觀—巨觀之間雙向來回的思考論證，所能成就的研究格局與說服力，應最能展現公共性、啟發性與延展性的學術意義。

只是，此研究格局所需的思路彈性、資料厚度與廣度，往往曠日廢時。在社群媒體發達之今日，追逐熱門流行議題、快速轉移研究興趣、發表形式朝向輕薄的趨勢中，要期待年輕學者與學子投入需要長期耐力才可能成就的研究模式，堪比要其從養成的文化中，轉移至另一種文化視野同樣的困難。而相對資深學者不論基於時間、體力、升等、忙碌、孤寂感、能見度等各式原因，樂意投入深刻且微觀與巨觀間扎實辨證的研究狀態者，也愈見稀少。

以下，我以兩場與中國研究有關的討論活動，作為概念性分類的具體案例，簡要回顧研究傾向的時代性與典範轉換，以前瞻研究方向。

二、以經驗性的中國研究為例

最近我參與了兩場中國研究的討論活動，舉辦的背景和目標都頗為類似，即政治局勢驟變和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研究困境，境外學者要進入中國做研究愈來愈難。在此情況下，對需赴中國做田野調查的研究者而言，針對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的因應討論，實屬必要。以之為例，頗具研究傾向和典範轉換的參考意義。

其中一個活動是由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的張中復教授、劉子愷教授和高雅寧教授發起，因應無法前往中國進行人類學式田野調查的研究處境，在9月26日的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年會中籌組「挑戰、跨越、啟發：疫情衝擊下中國民族誌的研究展望與反思」論壇。我受邀發表的報告即類似此文的主標題〈從異文化研究、比較性研究、到世界化研究：中國研究的時代流轉〉，大致論點如下：

從學術的角度思考，當前的局勢變動帶來很大的研究挑戰，卻也可能成為研究轉向的契機。我概略回顧從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四十年，當代人類學的中國研究呈現的典範或類型轉向。

中國改革開放後，其作為一個在社會與政治上都令外界感到陌生的龐大「異文化」實體，吸引國際學者進入探索、調查、描繪與分析。此時研究多聚焦

於某一地點，有如學者分頭研究集體中國的地方縮影，暫以「異文化研究」為主要類型。初期先從沿海省分開始，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則陸續進入漢區內陸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2000 年代後，這類研究擴及西北、深入藏區、乃至北方多元族群地區。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後，變遷速度加快、幅度更大，世紀之交的中國急速朝向全球化，而 21 世紀初的中國研究，也已從「異文化研究」轉向「比較性研究」。儘管兩種類型的研究並存，前者也是後者的重要研究基礎，但後者的研究趨勢逐漸超越前者。不論田野地點何在，針對社會變遷中的各式現象與問題、社會與政府反應等研究關注，皆與其他國家社會曾經面臨的社會變遷問題，進行比較性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基於人類學的地方關注與研究方法特性，此類比較性架構並非是指同時進行中國內、外的經驗性研究，而是在問題意識、分析面向與研究方法上的比較觀點，以彰顯中國現象的普遍性或特殊性。

進入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的世界強國企圖嶄露無遺。此時，欲以既有異文化導向的「中國架構」研究格局，來討論中國本身、中國效應、世界對中國的影響、或中國在全球化當中的角色等議題，已明顯有所侷限。在此趨勢之下，「世界化中國」(Global China) 的研究類型逐漸成為顯學。這正是今年初我與幾位年輕同仁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成立「世界化中國研究群」的時代背景和研究目標。

同樣值得注意的趨勢是，中國學者的研究能量，也在改革開放後三、四十年間起了變化。有些已從「被研究者」、「地方的研究合作者」發展轉型並試圖追趕世界。在此時代流轉中，外界的中國研究，若仍欲以「異文化研究」格局為主，可能將逐漸難以超越中國學者。至於比較性研究，少數優異的中國學者也可能不再讓國際學者專美於前。

不少中國出身的國際學者挾其個人能力與母國人際網絡優勢，不論是哪種研究類型，皆可能在國際中國研究中嶄露頭角。然而，卻也可能囿於政治忌憚，在研究議題或分析書寫上出現特定選擇性傾向。相較之下，那些無法受其關注的重大議題或討論方向，卻可能是其他國際學者更能發揮探索與分析之處。

從此簡單回顧，可以看到 21 世紀研究中國的關鍵意義。那便是，比較性、尤其具有世界化格局的研究題目皆已難以迴避中國因素。甚至，對於中國的研究與理解，亦非必然是在中國進行的研究。

這個研究趨勢轉向，加上疫情導致無法進入中國深入研究的限制，是否可能促進中國研究的目標轉型？例如，建立在既有的中國研究基礎上，讓「異文化

研究」的類型留給中國本地學者，加強比較性觀點的研究與詮釋，著重開展世界化中國的研究，讓對中國這個充滿政治雄心與劇烈社會變遷的龐大實體的認識理解，不再只是被放在「異文化」或平行比較的位置，而是體認到它已成為影響「我們」的一部分，異己與自我的研究界線將不再如以往明顯。

另一場活動，則是由我和陳宜中博士、不同學科領域的中國研究學者共同推動，於 10 月 15 日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專題中心主辦的「中國經驗研究的回顧與前瞻：1980s-2020s」座談會，邀請十二位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分成四個十年，就其最初進入中國進行田野研究時的問題意識、時代背景、研究方向與田野經驗，開啟在臺灣相關學界中的跨學科、跨領域對話交流。從座談會的議程¹可以看出學科及時期的多元性。

這場座談會的討論很有趣，由人類學家黃樹民院士開始分享，他應該是臺灣學界中在改革開放後最早（1981 年）進入中國的海外學者。他回顧 1960 至 1980 年代，以美國為主的國際思潮與新馬克思主義學界對蘇聯的唾棄，以及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期待氛圍。當時，「為何要研究中國？」是一個在理論與人類發展上的大哉問，儘管後來國際學界很快就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現實。早期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皆有類似的核心關懷，從巨觀出發，進入中國某地研究，在巨觀—微觀—巨觀之間進行研究與分析的辯證思考。

接著，進入 1990 年代，從政治學者的分享可見，關於制度治理的比較性研究是很顯著的方向。換言之，出現從 1980 年代意識形態關注到強調制度體系的典範轉移，如何全局性看中國成為主流的研究目標。

進入 21 世紀後，很明顯的趨勢則是，意識形態與巨觀格局的比較性研究明顯減少，取代或至少並行的潮流是分殊化、較小的議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田野移動，研究出發點多朝向深入微觀。理解不同日常面向的中國特色成為主流，可謂新型態的異文化傾向。有些研究仍存有巨觀層面的問題意涵，有些則不明顯。

從這場座談中，可以大致看出不同世代在田野可行性與格局想像、可用方法、問題意識、理論關注或田野層次等方面的差異，在過去四十年呈現由巨觀朝向微觀發展的趨勢。一方面，這說明研究面向更具多樣性、更為深入；另一方面，分殊化的學術興趣卻也有讓研究成果逐漸碎化的傾向。

於是，當天的討論中浮現一種思考，即是否需要再度重視意識形態、制度政策等巨觀議題的中國研究？這個思考並非主張微觀不重要，而是如前所述，

¹ 詳見：<https://newsletter.sinica.edu.tw/25841/>

微觀與巨觀之間的來回思索已愈形重要。即如「世界化中國」研究所隱含的方法與內涵願景，僅有微觀或巨觀，都可能難以展現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或時代關注。

三、反思研究類型傾向

在動盪遽變的時代，巨觀格局的理解無可或缺，是全球與國家治理、經濟或學術典範轉移的必要眼光。而微觀則是讓巨觀理論得以有成的基礎，更是巨觀研究終將回歸的福祉落點。兩者缺一不可。

然而，要同時具備微觀與巨觀的眼光格局和充分資料，對相對短期的研究來說，並不容易。這正是為何跨學科和思考、交流、方法切磋與互用愈形重要。學術的主要意義是分工累積認識世界的重要知識，並非為了留在小社群之中相互賞析而已。後者的研究就長遠的知識累積而言不一定不具意義，但欠缺明顯的學術公共性意識。

基於當前時代的快速變遷，不論研究問題意識是從巨觀或微觀出發，也許皆需重思基本問題：理論是什麼？理論的目標或存在價值為何？在此我不欲以引用學術術語的方式來討論，而試圖回歸探索知識的初衷。

理論最素樸的定義應指基於現象觀察與思考分析後形成的啟發性觀點，超越止於微觀層面的意涵，具有一定格局的抽象思考。理論得以指引我們對其他微觀現象的啟發性理解分析，擴大比較性的眼界。無法形成自己理論的研究者，若未借用理論指導，難以形成觀點；然而，儘管以理論為師，卻無法進行相應的研究，理論的指引也可能難以發揮推論或應用的具體效果。

概念理論與具體研究之間，就實作而言便是巨觀與微觀之辨。縮小落差或有效扣合的方法並非玄學，而是能否看見研究者在類型光譜中的傾向，以期面對限制、發揮潛力，因應時代挑戰。